

# 檢視「世界競爭力評比」在台灣的引入過程與影響<sup>1</sup>

吳沛憶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為會議論文初稿，歡迎評論，未經作者同意，切勿徵引)

## 摘要

本文提問為：發展型國家為什麼會主動擁抱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的「世界競爭力評比」？

透過檢視「世界競爭力評比」在台灣的引入過程，包括時機、動機、行動者間動態互動。發現「世界競爭力評比」在台灣最早是1990年由〈天下雜誌〉獨家獲得授權轉介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每年5月發佈的〈世界競爭力報告〉。隨著「世界競爭力評比」報導，輿論開始出現「競爭力衰退」危機，敦促政府排開政治，回歸經濟救國。1996年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李登輝在就職典禮演說中，宣布「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未來目標。社會一片支持「提升國家競爭力」，然而對於「國家競爭力」定義並未一致，各自援引想像。IMD「世界競爭力指標」最後進入政策領域，成為「國家競爭力」的唯一標準。民間也開始以競爭力排名檢視政府績效。

作為一個強國家傳統，且不具自由市場信念的社會，新自由主義化的動力為何？本文認為，台灣引入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治理技術之一的「世界競爭力評比」的動力，並不是先接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尋求政府改造。而是政府面臨國內政治壓力，引入看似客觀且具國際權威的「世界競爭力評比」作為治理工具，以證明行政績效。在追逐抽象排名的同時，我們也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我們是在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同時接受意識形態，而非先認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才採取實踐。

關鍵字：世界競爭力評比、國家競爭力、IMD、新自由主義、發展型國家

---

<sup>1</sup> 這個研究的發想來自於參與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新自由主義工作」，感謝工作坊兩位老師謝國雄、古明君與所有成員的建議與討論。然而本文尚為初探階段，受限於時間與個人能力，只呈現初步結果。當中不足與疏漏之處當屬我的責任。這邊文章將於2011年12月11日發表於「2011年台灣社會學年會」。

全國同胞們：今天我們在台灣實現了中國人的夢想！…五十年來，我們在台澎金馬的艱苦奮鬥，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曾被西方國家認定為專制、封建、貧窮、落後的中國人，已經在台澎金馬地區開創了民主、富足、進步的新局…

…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同等重要。沒有成功的經濟發展，我們會失去一切。為了厚植國家實力，讓中華民國能在國際社會，以至未來國家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必須依據既定時程，如期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並且同步規劃推動跨世紀的國家建設，儘速營造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經濟體系，建設低稅負、無障礙的企業投資環境，改革土地制度，壯大中小企業，提升國家競爭力，以迎向互利共榮的亞太新世紀，成為國際繁榮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

摘錄自〈1996年李登輝就任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就職演說〉

## 一、 提問

每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佈「世界競爭力報告」，或者世界經濟論壇（WEF）發佈「全球競爭力報告」<sup>2</sup>，台灣名次的進步或者倒退總會成為在媒體上引起討論，成為政府證明施政成績的論據，或是成為民間包括媒體、政黨用來批評政府施政不力的證據。「世界競爭力評比」除了在輿論層次、政治角力層次具有影響力，它事實上也直接影響到政策的修訂。不論是IMD或者WEF發佈報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例行性執行兩件事：一、發佈新聞稿，自我說明排名名次前進或倒退原因；二、稍後製作「檢討報告」，由經建會評定各項政策與制度修改後責成相關部會執行，並訂定檢核進度。

這個現象引起了一個疑惑：發展型國家為什麼會主動擁抱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的「世界競爭力評比」？而更進一步的困惑是，作為一個強國家傳統，且不具自由市場信念的社會，新自由主義化的動力為何？

---

<sup>2</sup> IMD使用「世界競爭力」（World Competitiveness）名稱，WEF使用「全球競爭力」（Global Competitiveness）名稱，一般用法常使用「國際競爭力」。以上三者所衡量的對象為「國家競爭力」。由於本文研究對象為IMD指標，因此使用「世界競爭力評比」是特定指IMD所做的評比，使用「國家競爭力」、「國際競爭力」則未特定指涉。

這個疑惑，在理論層次涉及目前尚爭議中的政治學、社會學辯論，台灣作為「發展型國家」在 1990 年代經濟自由化後式微了嗎？台灣「新自由主義化」了嗎？因此，我也將在結論部分一併討論，透過本文個案分析，對於這項理論討論有什麼可能的啟發。

這份研究希望透過檢視「世界競爭力評比」在台灣的引入過程，探究三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在現象上重建引入過程，包括時機、動機、行動者間動態互動，釐清引入的動力、造成的影響；二是透過此個案重探「發展型國家」概念相關研究討論；第三是，重探新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如何自西方擴散到其他社會，「擴散」是否是如此「自然」的演進過程？必須要承認的是，本文作為此研究計畫的初探，在第一個層次完成度較高，第二、三部分還待未來繼續探究。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一、提問。二、「世界競爭力評比」－從理論到實踐：（一）國家競爭力：從理論到政策、從企業競爭力到國家競爭力；（二）實踐技術：國家競爭力指標與報告。三、「世界競爭力評比」－台灣個案：（一）台灣引入 IMD「世界競爭力評比」的過程；（二）引入 IMD「世界競爭力評比」的效果；四、結論：「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

## 二、 「世界競爭力評比」：從理論到政策

### （一）國家競爭力：從理論到政策、從企業競爭力到國家競爭力

關於競爭力（competitiveness）如何從管理學的理论層次，進入到政策論述領域，最後擴散到世界各國政府都追求的目標，並成為普遍大眾熟悉的論述。英國的社會學者 Sum, Ngai-Ling 將文化帶入政治經濟學分析，特別以東亞地區新加坡、香港為個案研究，對此已累積很值得參考的研究成果。她整理出競爭力論述形成的三階段，從 1960 年代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提出的創新理論，

到 1980 年代哈佛商學院教授麥克波特 (Michael E. Porter) 首先提出「企業競爭力」再到 1990 年代提出「國家競爭力」,發展出著名的鑽石理論,最後成為廣泛流通於形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策略與政策。

「競爭力」相關的理論研究,自 1960 年代熊彼得提出創新理論起,就有許多相關研究,競爭力主要表現源於技術和組織創新,在這個階段還只是理論名詞。這些理論名詞在 1980 年代被轉譯進國家地緣—經濟競爭力(national geo-economic competitiveness)問題的政策論述。發生的關鍵點在美國和英國,經濟統計、日常生活經驗都指向經濟低成長、高失業率、漸增的公債、高通膨的問題。(d' Anfdrea Tyson 1988 ; Krugman 1995)。這些經濟轉變被描述為「競爭力的喪失」,特別是相對於在歐洲和東亞快速成長的經濟體。雷根政府為了回應這種情勢,在 1983 年成立了產業競爭力委員會(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1988 年轉成競爭力議會(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這兩個組織都由產業、勞工、學術領袖組成,將國家競爭力問題塑造成政策論述和公共意識的一部分。這個趨勢又因 OECD 而強化了科學與技術的重要性。雖然 OECD 早在 1962 年就已投入這個典範,但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再次進入這個場域,在技術、生產力和經濟成長上,生產了更多詳細的政策資料和分析,競爭力被描述為「科技政策」(technology policy)和「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see Miettinen 2002)這個從理論典範到政策典範的轉移在 EU 發表歐洲議會白皮書中的成長競爭力和就業(1993)、創新綠皮書(1995)、Libson Strategy for Competitiveness(2000)等後又被強化。(Sum, 2009)

熊彼得啟發的競爭力研究興起作為重要的政策典範,也被管理學理論和商學所強化和支持。在這個階段,管理學進入了新的政策典範。管理/顧問知識被專家們,例如商學院教授(例如哈佛商學院教授麥克波特)、顧問公司和智庫所創建。他們建構出宣稱可以解決競爭力問題的模型,並且販賣顧問、研究,形成了一個跨國的管理知識圈。例如說,在台灣被譽為「競爭力大師」,時常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或受邀來台演講評論台灣經濟政策方向的哈佛商學院教授麥克波特,他

同時也是企業和產業界競爭力分析的顧問。他的研究在政策領域很早就獲得關注(例如，他是雷根第一個競爭力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他後來將企業層次的分析應用到國家研究。1990年，他出版最賣的一本書《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研究10個國家的產業，解釋為何一個國家會在某些產業成功而非其他產業，和為何有些產業在某些國家比較有競爭力而非其他國家。建立了著名的鑽石理論和群聚理論(cluster)，都成為許多國家政策參考，競爭力也因此大眾化，成為人人琅琅上口的詞彙。(Sum, 2009)

## (二) 實踐技術：國家競爭力指標與評比報告

目前評估全球競爭力的機構中，最被重視的就是位於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學院(IMD)，另一是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WEF)。最早自1979年，WEF就已經持續進行全球競爭力評比計畫(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Program, GCP)，當時是與IMD合作，以世界競爭力年報的名義發布評比報告。1990年麥克波特提出國家競爭優勢的鑽石理論模型後，IMD和WEF參考其理論基礎，建立國家競爭力評估模式。直到1996年，兩個機構由於對國家競爭力的理念不同，而分別出版各自的全球競爭力評析。(朱景鵬，2009：20；行政院研考會，201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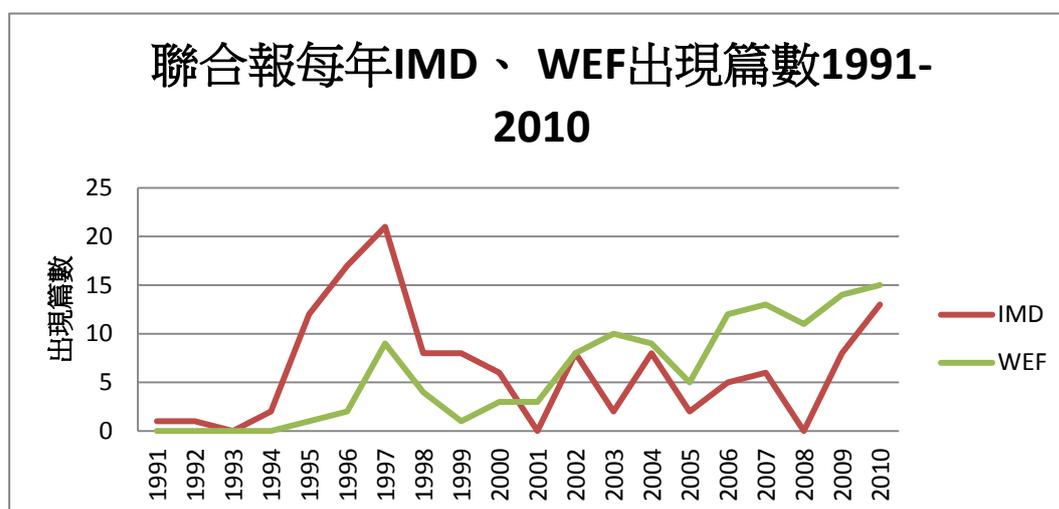
表1 IMD與WEF國家競爭力評比比較

機構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MD)	世界經濟論壇 (WEF)
報告	世界競爭力年報(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每年5月發行。	全球競爭力報告 (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每年10月發行。
國家競爭力之定義	一國經由經營其資產之加工過程、吸引力、積極性、全球化及親和性，並將此種關係整合為經濟和社會模式，來創造附加價值，以增加國家財富的能力。(IMD, 1996)	一國達到永續經濟成長及高國民平均所得目標的總體能力。(WEF, 1996)
	強調過去1年經濟表現的各項短期性量化指標。亦強調創造財富的能力，主要是每人國內生毛額被創造出來	強調一國未來5至10年經濟成長潛力 (WEF, 1996)。亦指認為每人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的速度應該具備的競爭力。(WEF,

	的能力。(IMD, 1996)	1996)
調查方式	主觀調查指標占3/1，量化指標占3/2。(IMD, 2008)	主觀調查指標占70%，量化指標占30%。(WEF,2008)

雖然WEF的評估指標被認為較有理論基礎，近年來較被台灣政府重視，也較常被新聞報導引用（見圖一），但是本研究挑選IMD國家競爭力指標作為研究對象，有以下兩點原因：一、IMD競爭力報告較常被《天下雜誌》報導，且自1990年起就獨家獲得授權，在該雜誌刊登IMD競爭力報告。二、「國家競爭力」首度進入政策語彙是在1996年，當時行政院經建會參考IMD國家競爭力指標制定政策修改報告。此後每年度發佈競爭力報告，經建會都會發布新聞稿，製作檢討報告，並擬定指標排名目標。國家競爭力理論透過知識工具，像指標和報告，把國家建構成市場的競爭者。這種指標和數字變成衡量國家經濟表現的標準。將越來越多國家捲進競爭力的排名遊戲，並在競爭遊戲中將它們分成高成長經濟體和衰退經濟體。這種評比技術讓國家臣屬於競爭力，並使它們面臨依特定建議（像強國看齊）改變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壓力。不只是在台灣，這種排名論述經常被各國政府官員、智庫和記者用來傳遞驕傲、需求、或對經濟重整的恐懼。例如，行為者可能以指標排序的後退作為「經濟挖空」的恐嚇或跡象。這可以給政府、企業、共同體甚至個人壓力，要使自己更有競爭力。(Sum, 2010)

圖1 聯合報每年IMD、WEF出現篇數1991-2010



因此，我希望可以透過檢視IMD世界競爭力指標引入台灣的過程，是誰引入？什麼時候？為什麼引入？將看似客觀、科學的競爭力評比去自然化，世界競爭力指標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一項治理技術，由具發展型國家特色的政府主動接受納入決策，不是「跟隨世界潮流」這麼理所當然的過程。引入的動力是什麼？是否遭受阻礙？產生什麼影響與效果？

### 三、「世界競爭力評比」：台灣個案

#### （一）台灣引入IMD「世界競爭力評比」的過程

這一小節我將IMD「世界競爭力評比」引入台灣的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1）競爭力衰退；（2）新政府跨世紀的承諾－「提升國家競爭力」，21世紀以前進入全球前5名；（3）什麼是國家競爭力？眾說紛紜；（4）獨尊IMD；（5）質疑IMD指標。

發現1996年總統李登輝在宣布「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施政主軸時，事實上尚未訂定國家競爭力的實際內涵。「提升國家競爭力」一時之間成為報紙上頻繁出現的話語，政府新聞、學者專家投書、民眾投書高度頻繁，然而定義眾說紛紜，可以說「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政府、民間共識，但共識的內容為何，尚未一致。不過，目標有共識，內容沒共識，並不影響提升國家競爭力政策的推動，甚至因此更容易推行，因為社會對於競爭力內容的各式想像紛雜，當政府決定將IMD世界競爭力指標訂為目標，一方面為國際權威機構，一方面有專業理論作為論述，另一方面又有具體的名次與評比項目可供檢驗。很快就主導關於國家競爭力的話語。或許，也正因為「國家競爭力」一詞本身就夠模糊，容易將其他想像納入，因此能夠在定義還不明的情況下，就廣為被接受，產生共識。

在資料來源方面，這一小節的資料與蒐集方法有下三種：一、「聯合知識資料庫」分別搜尋關鍵字「IMD」、「國家競爭力」；二、「天下雜誌群資料庫」搜尋關鍵字「IMD」、「國家競爭力」；三、3份政府出版報告：1995年經建會委託長庚醫學暨工程學院《我國國際競爭力評估之研究》、1997年經建會《中華民國85年經濟年報－提升國家競爭力》、2011年研考會《國際競爭力評比指標與運用策

略之研究》。

### (1) 競爭力衰退

在我目前翻閱的資料中，1990年7月《天下雜誌》是台灣內部首度介紹IMD「世界競爭力評比」的媒介，《天下》並取得獨家授權在台灣發佈「全球競爭力評比報告」。不過，這一次只是單純轉介而已，沒有做出評論。隔年7月，在編者的話中，主編殷允芃以〈競爭力與溝通〉為題，表示對於台灣自解嚴因國內舊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社會紛亂的憂心。企業界普遍認為國家競爭力滑落，但是政府不願正視問題，引用國際權威機構IMD的競爭力報告證明台灣競爭力確實在衰退，要求政府面對。當年的8月，也是聯合報首次出現IMD世界競爭力排名的報導，不過還只是在第11版經濟新聞版。1994年第7版綜合新聞報導〈台灣競爭力滑落至18名〉。要到1995年1月聯合報第一次以頭版報導〈新興工業國世界競爭力 台灣排名連年下滑〉。在台灣和在美國、英國一樣，國家競爭力開始獲得重視時，都是先建構出「競爭力衰退」危機，為了「提升競爭力」，政府必須檢討在競爭力指標項目中表現不佳的政策。

不過，從下面這篇聯合報第一次頭版報導IMD世界競爭力排名報導中可以看到，這個時期，政府雖然已經注意到IMD報告，但是還沒有將此作為國家競爭力的唯一標準。

經建會指出，競爭力的評選指標及權數並沒有客觀標準，不同研究機構的評估結果也有所不同。經建會並提出美國商業環境評估公司評等，近兩年來，我國投資環境均名列第二，僅次於瑞士；韓國產業研究院的評等也指出，我國政府部門及競爭力創出因素二方面均優於韓國及馬來西亞，次於新加坡。

不過IMD因長期進行世界競爭力評估，我國各項影響競爭力因素的排名變化，可看出我國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成績」。(聯合報，1995)<sup>3</sup> 除此之外，經建會並在9月，委託長庚醫工管理學院教授許士軍為召集人，希望自己建立指標，自我評估我國的國家競爭力。

經建會官員昨天說，政府這項自我評估，不是要粉飾排名，事實上，

---

<sup>3</sup> <新興工業國世界競爭力 台灣排名連年下滑> 【1995-01-19/聯合報/01版/】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所做的國際競爭力報告，我國排名也不差...韓國和荷蘭都有自己的評估。<sup>4</sup>（聯合報，1995）

顯見，雖然 IMD「世界競爭力評比」在 1990 年就已經引進台灣，但是直到 1995 年底，政府並未完全接受該評比的權威性，為了自我捍衛，還建立一套自我評估系統。

日期	行動者	版面	紀事
1990/7/1	天下雜誌		獲得瑞士洛桑管理發展學院（IMD）獨家授權，首度在台灣發佈「全球競爭力評比報告」。
1991/7/1	天下雜誌	編者的話	標題〈競爭力與溝通〉主編殷允芃撰文認為國家競爭力自解嚴以來已逐漸滑落，企業界苦於無法使政府官員相信，但 IMD 報告證實了這個說法。
1991/8/6	聯合報	第 11 版經濟	第一次報導 IMD 世界競爭力台灣排名
1994/9/8	聯合報	第 7 版綜合新聞	報導 IMD 報告台灣排名滑落自 18 名
1995/1/19	聯合報	頭版	第一次以頭版報導〈新興工業國世界競爭力 台灣排名連年下滑〉
1995/7/21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飛彈發射及軍事演習，表示抗議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
1995/12/27	行政院經建會		因前年 IMD「世界競爭力」報告我國排名跌至 18 名，次於馬來西亞名，行政院遂委託長庚醫學暨工程學院製作「我國國際競爭力評估之研究」完成

## （2）新政府跨世紀的承諾－「提升國家競爭力」，21 世紀以前進入全球前 5 名

1996 年 3 月 23 日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由李登輝連任，在前一年中共試射飛彈，導致國內經濟景氣受影響，民心慌亂，企業界與社會輿論都對新政府有「經濟救國」的期待。新政府在選後就提出「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構想」，將 2000 年達到全球競爭力前 5 名定為目標之一。不過該計畫只有施政願景，具體

<sup>4</sup> <經建會委託許士軍調查國際競爭力評估 十月出爐> 【1995-09-19/聯合報/19 版/經濟證券】

政策內容尚未訂定。將「提升國家競爭力」作為施政主軸的契機，是源自 5 月經濟部長江丙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突破制限、改革創新、提升國家競爭力-邁進已開發國家」專題報告，獲得總統李登輝重視，接下來幾天，專家投書、聯合報社論皆撰文表示支持江丙坤之構想。5 月 20 日總統就職典禮演說中就提出「儘速營造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經濟體系，提升國家競爭力是國家未來的施政方向。」將以自由化和國際化為目標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和提升國家競爭力計畫合一共同推動。6 月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更以「跨世紀的承諾」宣示政府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決心。

日期	行動者	版面	紀事
1996/4/25	經建會	頭版報導	提出「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構想」，將 2000 年達到全球競爭力前 5 名訂為畫目標之一。
1996/5/1	經濟部長江丙坤	頭版報導	經濟部長江丙坤在國民黨中常會提出「突破制限、改革創新、提升國家競爭力-邁進已開發國家」專題報告。
1996/5/3	高希均	第三版焦點新聞	投書支持江丙坤「提升國家競爭力」提議，並建議行政院組成產官學代表工作小組，限期 3-6 個月提出具體辦法。
1996/5/5	聯合報	第二版要聞	社論〈呼應江丙坤部長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倡議〉
1996/5/6	逢甲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鄒繼琳	第十一版民意論壇	投書〈主動推展兩岸成為「自由貿易區」，讓「兩岸和平」推高國家競爭力〉
1996/5/20	總統李登輝		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儘速營造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經濟體系，提升國家競爭力是國家未來的施政方向。」
1996/5 月底	IMD		公布台灣世界競爭力排名滑落至 18 名。
1996/6/7	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		在行政院記者會中指出：「行政院要以提高國家競爭力為革新的主軸。要在 21 世紀來臨前，進入全球前五名。」

### (3) 什麼是國家競爭力？眾說紛紜

「提升國家競爭力」政策出現的背景為企業界、社會輿論對於經濟衰退的憂心，因此該政策一提出即獲社會各方響應，行政院也將此訂為「全民運動」。除

了新聞量暴增以外，投書量也增多。由中國生產力中心號召組成民間「競爭力策進會」，預定推動一場全民心靈改造；部分立法委員自行開設「台灣競爭力發展顧問公司」，宣稱提供企業諮詢；民間舉辦「提升國家競爭力」座談會討論對國家競爭力的看法等等。仔細翻閱資料，發現各方對於國家競爭力的認知其實大不相同。

例如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鄒繼琳投書中指出，競爭力的具體指標應為「經濟成長率」和「國民所得」，「檢驗競爭力的成果，有一個更具體的國際排名指標，即經濟成長率與國民的生活水準；如果競爭力的提升不能反映到較快速的經濟成長與生活水準的提升，那就是競爭力指標的編製有問題了。<sup>5</sup>」。聯合報社論則是認為，國際競爭力機構眾多，各方指標不同評比結果也不同，應該破除排名迷思，只要政府認真規劃政策，本身就是國家競爭力的提升<sup>6</sup>。「競爭力策進會」表示將製作一套指標調查民意對立法委員的看法以監督國會，另外認為，提高生活品質就是提升競爭力，主張將提高生活品質的方法納入小學教科書，以推動「心靈改造」。革心內容包括永續發展的新社會運動、EQ的教育推廣、綠色生產力的擴大推廣、加速學習方法的終身學習、社區意識的塑造，示範區的建立等。可以發現，在表面看來「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共識，事實上內容根本莫衷一是。

「競爭力民間策進會」召集人石滋宜在聯合報投書中說明他對於「國家競爭力」的定義：

....所謂的「國家競爭力」畢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IMD(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所提的競爭力衡量指標在中細項分析上雖可以反映出國內現況的許多問題，例如政府透明度及效率、社會安定等，但其排名值僅能說是一個評量的參考，不是我們提升競爭力的目的。

....如果以更簡單的方式來描述這個定義，則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目標就是在構建一個大同世界，可以真正的幼有所托、壯有所用、老有所

---

<sup>5</sup> <提升全球競爭力 攀登巔峰 讓市場力量掃除干預毒瘤>【1996-06-09/聯合報/11版/民意論壇】

<sup>6</sup> <重點改善政府施政才能提升國家競爭力>【1996-06-10/聯合報/02版/要聞】

養，並且在民生、社會、經濟等方面也能真正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  
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聯合報，1996）<sup>7</sup>

日期	行動者	版面	紀事
1996/6/9	逢甲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鄒繼琳	十一版民意論壇	投書指出競爭力的具體指標應為「經濟成長率」和「國民所得」。
1996/6/10	聯合報	第二版要聞	社論呼籲破除排名迷思，認為不同國際機構指標標準不一，行政部門只要能認真規劃及推動關鍵性的政策課題，國家競爭力就會自動提升，不須追求排名。
1996/6/14	總統李登輝		指示「政府可以考慮邀請產、官、學及民意代表成立一個專案組織，探究國際間普遍重視的各項競爭力評量指標；依據這些指標，切實地分析我國和其他發展程度相近的國家、地區或經濟體，彼此間的相對優缺點。」
1996/7/1	行政院		成立「行政院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由產官學代表組成界定為「全民運動」。
1996/7/6	副總統連戰		在「行政院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綱領」上宣布將參考 IMD 及 WEF 的競爭力評比報告制定競爭力指標，組成 7 個工作小組。
1996/7/7	競爭力策進會召集人石滋宜		民間組成的「競爭力策進會」表示將製作一套指標調查民意對立法委員的看法以監督國會，另外將與教育部長討論將提高生活品質的方法納入小學教科書，以推動「心靈改造」。
1996/7/11	台灣競爭力發展顧問公司		廖福本、施台生等為首的一些國民黨籍中央及地方民代便串連合組「台灣競爭力發展顧問公司」。

#### (4) 獨尊 IMD

雖然從上述資料呈現出來的是眾說紛紜，但是經建會「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的研究報告與政策規劃也陸續出爐。研究報告參考 IMD 和 WEF 競爭力報告歸納出需要改善的項目，除了制定政策改善以外。該小組也擬定規劃一套自我評估指標，預定在每年 5 月 IMD 世界競爭力報告出爐前，先自我預估排名落點，已確保排名不會滑落。最後是從 IMD 的 224 指標中選定 100 項，衡量我國國情增加 38 項，總共 138 項競爭力指標。至此，以底定以 IMD 國家競爭力報告

<sup>7</sup> <專家論衡一場全民自發性的競爭力提升運動，石滋宜> 【1996-07-20/聯合報/19 版/經濟】

排名為衡量「提升國家競爭力」施政效果。

但是，這個獨尊 IMD 指標為「國家競爭力」標準的過程，也沒有這麼的順利無阻。從中央銀行幾次表示 IMD 的評比不公平，表示「可能因企業與央行觀點不同，才有這種結果。...央行高級官員指出，一般來說，央行的天職是維持物價穩定，要問央行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究竟是指促進經濟大幅成長，可以獲得較前面的排名，還是反過來排名在後？央行認為，在維持物價穩定及促進經濟適度發展，央行都做得不錯，排名不該在那麼後面。」可看出，作為新自由主義技術之一的競爭力指標，和具計畫經濟色彩的台灣政府相遇，還是會遭遇衝突。但是政府為了將自己國家當作世界市場中的良好投資環境，必須要妥協改革。央行稍後就應經建會計畫成立「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財政金融分組」，依 IMD 報告列出影響我國競爭力的劣項，包括：資本市場限制、內線交易嚴重、金融法規無法穩定金融以及「中央銀行」本身。

中央銀行雖配合經建會規劃，必須依 IMD 標準自行檢討。對此還是反應任為指標未必客觀：

...不過，對於IMD對台灣調查所列出的負債中，財部和央行認為並不是每一項都很客觀。其中中央銀行在競爭力指標中排名落至二十六名成為「負債」，陳木在的解釋是，中央銀行必須兼顧經濟成長及控制物價，矛盾性很大，央行不能為了經濟成長而放棄其自主性。（聯合報，1996）<sup>8</sup>

日期	行動者	版面	紀事
1996/7/11	經建會主委 江丙坤		經建會主委江丙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向總統李登輝報告「提升國家競爭力，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表示 IMD 和 WEF 的競爭力報告排名都顯示我國弱項為「經濟建設」和「經濟開放程度」。

<sup>8</sup> <提升競爭力 央行財政部任務分組> 【1996-07-24/聯合報/19 版/經濟】

1996/7/15	行政院經建會	經建會副主委薛琦引用 IMD 對國家競爭力的定義：「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創造財富的能力與八大類有關，包括國內經濟實力、國際化程度、政府效率、企業管理、金融實力、基礎建設、科技實力、人力及生活素質。」
1996/7/19	中央銀行	央行不滿 IMD 對其評比排名落後，表示可能因企業與央行觀點不同，才有這種結果。
1996/7/24	中央銀行	央行應經建會計畫成立「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財政金融分組」，列出影響我國競爭力的劣項，包括：資本市場限制、內線交易嚴重、金融法規無法穩定金融以及「中央銀行」本身。
1996/9 月	行政院經濟會	參考 IMD 指標，歸納出 134 項競爭力指標。

### (5) 質疑 IMD 競爭力指標

新政府自 1996 年 5 月就職以來，在一年之內以經建會為召集，組成跨部會「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依 IMD 指標全面檢討包括經濟實力、行政效能、國際化程度、市場開放等等。還參考 IMD 指標自行制定「國家競爭力指標計算系統」，1997 年 3 月，預估當年競爭力應可進步 2 名。沒想到，IMD 當年報告台灣競爭力自 18 名倒退到 24 名。經建會副主委薛琦表示「我們對結果相當驚訝！去年一年大家相當努力。結果完全超乎理解與想像，我們要重新了解這項排名的參考價值。」並引用其他國際評比來質疑：「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今年二月公布的排名，台灣的自由度排名全球第七，去年我國對自由化努力了很多，包括資金的進出管制等，怎麼可能我國的國際化排名後退八名之多？」<sup>9</sup>「IMD 資料難以解讀，無法成為政策參考。」<sup>10</sup>

3 月 IMD 公布排名後，經建會隨即寫信到 IMD 詢問競爭力大幅落後的原因。4 月初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邀請 Michael Porter 來台出席「建構台灣競爭力」演講，IMD 最初設置競爭力指標就是以他的競爭力理論為參考，沒想到他反而說「IMD 報告就和你們的一百三十九項經濟指標一樣繁複，大家應該現實一點，不

<sup>9</sup> <我競爭力直直落,經建會大驚>【1997-03-27/聯合報/02 版/要聞】

<sup>10</sup> <WEF 競爭力評比 我升為第八>【1997-05-20/聯合報/04 版/政治】

要因為這些奇怪的東西而想不開。...IMD的調查結果的確可督促政府多做事，但是提升國家競爭力，政府不能全包，必須在產官學問有建設性的溝通和對話。」<sup>11</sup>

5月經建會乾脆把IMD校長請來台灣舉行公開演講說明台灣競爭力為何倒退，演講中表示「競爭力名次沒有那麼重要，較重要的是關鍵指標是否有進展。」針對記者詢問，台灣競爭力下滑的關鍵因素，他解釋：「第一，在意競爭力名次不重要；第二，名次應該「相對」來看；台灣並沒有走回頭路，只是台灣與其他國比較，「相對」而言，已經快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才在整體排名上有巨變。」<sup>12</sup>顯示出台灣政府比評比機構還要在意排名。面對政府開始質疑指標公平性，聯合報社論的回應是「質疑指標，不如面對問題」，「最近政府官員在檢討的，不是執行策略、方法，反而是質疑提升競爭力的指標有問題。真的是指標有問題嗎？恐怕是政府不肯面對問題！」<sup>13</sup>。雖然政府因為一年改革的成效沒有在評比中呈現，而開始質疑指標，不過顯示出來的反而是政府對指標排名的高度重視，因為經建會至今仍舊每年針對IMD報告修訂政策與法規。

日期	行動者	版面	紀事
1997/3/3	主計處	第二版要聞	主計處依自行制訂之「國家競爭力指標計算系統」，預估今年競爭力應可自18名進步至16名。
1997/3/27	經建會	第二版要聞	IMD公布當年世界競爭力排名為倒退至24名，經建會副主委薛琦表示需重新評估IMD指標的參考價值。
1997/4/7	經建會	第二版要聞	經建會去函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詢問今年我國競爭力排名大幅落後的原因，獲知去年我國經濟表現不佳，是最重要的原因。
1997/4/7	聯合報	第二版要聞	專訪競爭力大師、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Michael Porter，表示台灣IMD競爭力排名倒退，顯示需要一個更小的、減少

<sup>11</sup> <提升競爭力 產官學都有責任> 【1997-04-09/聯合報/02版/要聞】

<sup>12</sup> <競爭排名別在意 有利指標加把勁> 【1997-05-25/聯合報/06版/社會傳真】

<sup>13</sup> <質疑指標不如面對問題> 【1997-04-23/聯合報/06版/社會傳真】

			干預的，角色適度轉變的政府。
1997/4/8	競爭力大師 麥可·波特	第二版要聞	麥可·波特應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之邀，來台出席「建構台灣競爭力」演講，表示不須太看重 IMD 指標，該指標可敦促政府，但提升競爭力應由產官學合作。
1997/4/23	聯合報		批評政府「質疑指標，不如面對問題」。行政院不必為了波特教授的質疑而否定自己，也不必因為一時的執行不力而洩氣。
1997/5/25	IMD 校長彼得羅藍吉	第六版社會傳 真	IMD 校長彼得·羅藍吉應經建會之邀，來台北舉行公開演講說明為何台灣競爭力排名大幅倒退。表示總排名不重要，應找到有利指標項目發展。

## (二) 引入 IMD 「世界競爭力評比」的效果

從 IMD 「世界競爭力評比」在台灣的引入過程來看，政府是先宣示「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施政願景，以競爭力排名提升為目標，為了爭取排名名次，才將 IMD 指標項目制定為具體內容。政府對於競爭力指標項目及其背後的新自由主義理性，看起來比較像是結果，而非政府一開始就接受的理性。對於 IMD 評比機構來說，是以競爭力理論為基礎，設定指標，排名評比是結果。但以台灣例子來看，對於政府來說，比較像是順序相反，以排名為基礎，參考指標，然後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理性的競爭力理論。那麼，到底競爭力指標背後的理性是什麼？政府在追求排名的同時，又做了那些改變？

這部分，我將透過 1991 年至 2010 年《聯合報》和《天下雜誌》報導中使用 IMD 競爭力指標的評論與檢討項目，來探索該指標的效果為何。操作上，在全面閱覽內含關鍵字 IMD 的報導後，歸納出 13 項使用脈絡：國際化程度、總體環境(基礎建設、制度法規)、市場健全(少干預、金融自由化)、企業表現、政府財政、政府行政效率、政府清廉、政府縮減、國內政治安定、社會凝聚、兩岸關係要開放、評論指標、科技表現，逐一登錄每一篇報導中出現使用 IMD 指標符合的使用脈絡，一篇報導可能有複數個使用脈絡。最後進行統計，分析各項使用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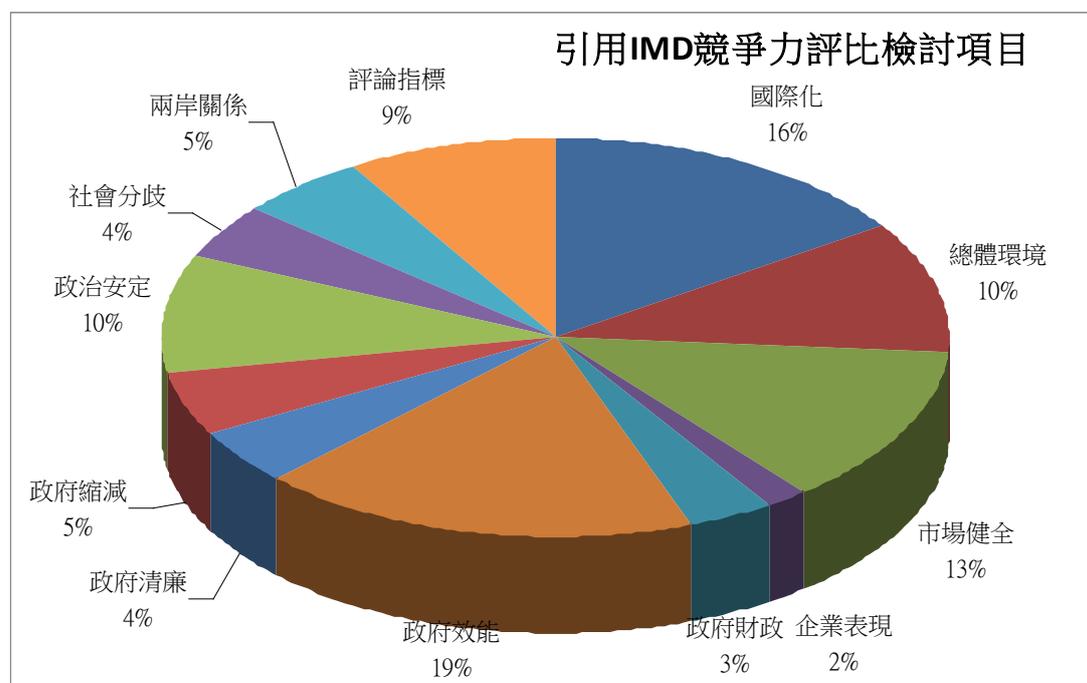
絡比例。由於《聯合報》的日報性質，各方行動者較多，因此還另外統計行動者，希望可以看出國際研究機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動態。

主要檢討項目：

◆ 搜尋關鍵字IMD，統計聯合報1991-2010年105篇報導使用脈絡。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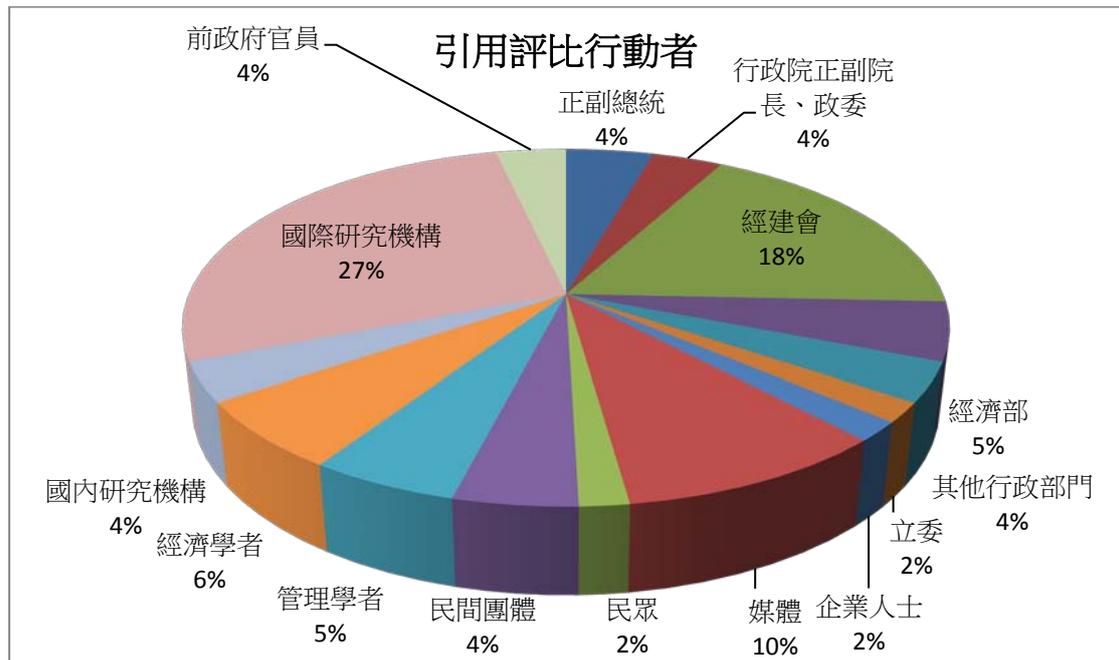
前5名依序為：政府效能、國際化程度、市場健全、總體環境、政治安定。

圖2 聯合報1991-2010年105篇報導引用IMD競爭力評比使用脈絡比例分布



◆ 引用評比行動者，前3名依序為：國際研究機構（IMD 發佈者）、經建會、媒體（聯合報）。（接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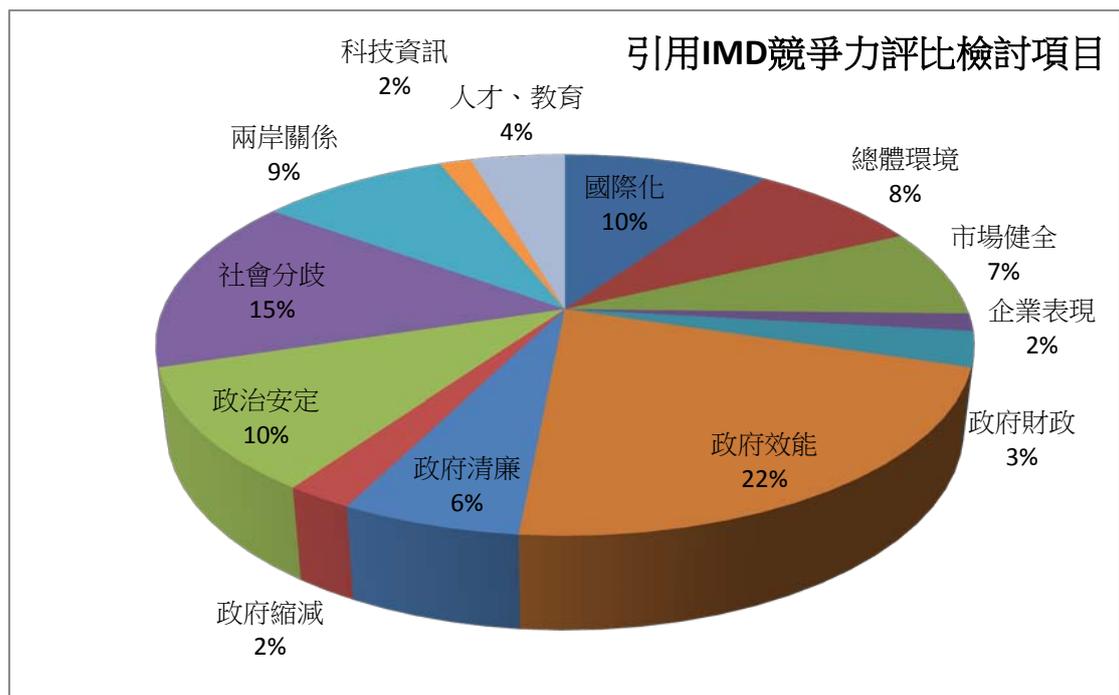
圖 3 聯合報 1991-2010 年 105 篇報導引用 IMD 競爭力評比行動者比例分布



◆ 搜尋關鍵字 IMD，統計天下雜誌 1991-2010 年 147 篇報導。結果如下：

檢討項目前 5 名依序為：政府效能、社會分歧、國際化程度、政治安定、兩岸關係。(接下頁)

圖 4 天下雜誌 1991-2010 年 147 篇報導引用 IMD 競爭力評比使用脈絡比例分布



綜合《聯合報》和《天下雜誌》的統計結果，檢討項目前 5 名中有 3 項是重疊的：政府效能、國際化程度、政治安定。另外社會分歧、市場健全、兩岸關係、總體環境也是常檢討項目。政府效能在兩份媒體中出現比例皆高出其他項目比率很多。從這個結果可以發現，「政府效能排名」是最常被拿來檢討「競爭力衰弱」的指標，「近日來各界紛紛探討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明顯地，目前諸多問題的來源，大抵可歸因於政府部門行政效率不彰或法規不合時宜，致使決策無法落實有效執行。<sup>14</sup>」伴隨著每次發佈競爭力排名，這種「政府效能拖累競爭力」是常見的敘事方式。以「提升競爭力」為施政主軸的政府，事實最常被稱為提升競爭力的絆腳石，相對於指標中企業表現的排名，政府效能的排名時常是將總體排名拉低的原因。其實綜觀IMD世界競爭力指標，最常被拿來檢討的項目，包括政府效能、政府縮減、國際化程度、政治安定、總體環境（基礎建設、制度法規）、市場健全等等，針對的對象正是政府。尤其指標評定有三分之一是針對在該地的外國經理人作問卷調查，所評比的是將該國是否適合投資。政治紛擾、勞資糾紛、法規限制、立法院審議效率、市場保護，都是外資希望該地政府能夠解決與改善的項目。除了外資以外，本國企業界也會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為由，要求政府解決勞資糾紛，例如限制勞基法適用範圍，或者要求政府縮減福利。例如遠東企業集團董事長曾就勞基法爭議撰文投書：

我國企業界目前由於人事成本持續升高，國內外景氣低迷，製造業已停滯發展，產值比重逐年增加的服務業也受到嚴重的衝擊，大部分企業都在夾縫中求生存，倘若勞基法再擴大適用範圍，將雪上加霜，迫使企業大批外移，導致產業空洞化，亦可能影響有意來台投資的外商，無法落實「亞太營運中心」。

當我們正努力推動「亞太營運中心」，並要在公元兩千年前，將國家競爭力提升到全球前五名，本人願在此提出幾點改善勞資關係、振興國家經濟的建議，供大家參考。

---

<sup>14</sup>【曾德宜／預官 台北市】【1996-07-22/聯合報/11 版/民意論壇】

一、勞資雙方，應該切記「家和萬事興」，以和為貴，避免衝突和對立；並且都應該中立行事，多為對方設想，避免個人強出頭式的本位主義，或激起高張的對立情緒。尤其基於「生命共同體」的信念，勞資雙方也應互信、互助、互諒。

二、政府應落實自由經濟體系。勞動市場具有自動調節的機能，政府制定或修正法令規章時，不宜給予太多硬性的規定和干預。

三、為了提高國家競爭力，應仔細衡量高福利與過度保護的勞工政策是否符合世界潮流，是否有利於整體經濟？<sup>15</sup>（聯合報，1996）

綜合以上，可以初步歸納幾項結論。一、IMD 世界競爭力評比在《聯合報》和《天下雜誌》中最常被引用來檢討政府效能，其它如國際化程度、市場健全、總體環境（制度法規、基礎建設），也是敦促政府朝向新自由主義化政策。可以說「世界競爭力」指標的規範對象是各國政府，規範法則是傾向開放市場、資本流通的新自由主義，最後達到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效果。如 Pierre Bourdieu 在〈反對去政治化的政策〉一文中提到：「國家繼續在為削弱自身的這個政策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令人注目的是，剝奪國家以為金融市場政策服務的政策，正是由國家所頒定的。」（轉引自陳雨君，2010）並非是將政府角色去除，政府仍然被要求多所作為，只是退化成實行新自由主義秩序的科層管理者。

二、另外如政治安定、社會分歧、兩岸關係等檢討項目，規範的對象則不限定是政府，舉凡社會運動、勞資衝突、國家認同爭議等任何社會中的政治行動，在國際競爭力評比的邏輯中都會引起「影響外資信心」、「本國資本出走」等負面效果，具體展現在指標排名下降。不同於第一點去政治化是將政府去決策的效果，這種以「國家競爭力」狀似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使社會中的政治行動成為少數危害多數利益的對比，是另一種使政治行動汙名化的去政治化效應。

三、為什麼「世界競爭力評比」作為非強制性的評比指標，為什麼能夠

---

<sup>15</sup> 【1996-07-26/聯合報/11 版/民意論壇】

被廣泛接受，並至少造成上述兩項去政治化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指標排名具有中立化（掩蓋）意識形態的效果**。

儘管有不同的聲音，但是以數據來檢視政府的施政成果，基本上已經使政府部門開始有明確的競爭意識。行政院政務委員林振國就指出：「這是起步，至少可以讓政府知道在哪些地方落後、嗎些要加強。」...

正如一位資訊業負責人指出，數量化的指標就像血壓、心跳、體溫一樣，可看出體質，但重要的是要有具體策略與方法來改善，治療才能落實。<sup>16</sup>

（天下雜誌，1996）

如前所述，世界競爭力指標項目本身具有強烈的新自由主義理性，但是當它進入政策領域、媒體、日常語彙中，是以中立化的客觀數據出現，它甚至不需要論述，也不需要說理的過程。因為它以數字、排名的抽象形式出現，掩蓋了背後的意識形態，不只是被接受，還成為政府主動追求的績效證明，以及民間用來檢視政府績效的判準。

#### 四、結論

發展型國家為什麼會主動擁抱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的「世界競爭力評比」？本文在檢視「世界競爭力評比」在台灣的影響後，對於回答這個提問可以有什麼啟發？「世界競爭力評比」毫無疑問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技術實踐，然而，它最主要敦促的對象是政府，它不是要求政府退出，事實上政府被要求的作為項目比以往還要多。國家的角色不但並未消退，甚至可能更為吃重。要怎麼解釋這個狀似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相矛盾的現象？要因此解釋「發展型國家」尚未式微，因為國家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或者，國家更加整合入世界市場，因此已新自由主義化了？

國內在1990年代末期起開始出現許多「發展型國家式微了嗎？」的研究與討論（鄭為元1999；瞿宛文2000；呂建德2001；王振寰2003；黃崇憲2004、2008；

---

<sup>16</sup> <競爭力有指標，沒目標？>【天下雜誌第186期 1996/11/01】

廖尉君2005；宋倩宜2007；王振寰、蘇耀昌），這些討論可以分作兩類型，並各有其時代背景。一類型是檢討台灣作為發展型國家，在90年代逐漸自由化後，還是發展型國家嗎？另一類型是自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後，《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西方學界新古典主義派開始抨擊「發展型國家理論」作為經濟發展模式的有效性，國內學者如瞿宛文、王振寰便是在這個脈絡下，主張國家對後進國家求經濟發展與追趕的重要性，並以高科技產業、石化業的經驗研究為實例，證明發展型國家模式對於經濟發展仍然有效。若再回到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起源與背景，參考林文斌的整理，日本、韓國和臺灣等東亞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表現，引起學者對經濟發展背後之動力的爭論。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主要以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y）（之後也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其後的依賴發展理論）和發展型國家論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三者的爭辯。新古典經濟學重視市場，指東亞國家的經濟成長源於尊重市場機制。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重視國際因素（尤其是美國等霸權國家的政經力量），指其經濟發展係對霸權國家的「依賴發展」或來自霸權國家「邀請下的發展」。發展型國家理論則指經濟發展不全因市場和國際因素，主要來自國家的努力。但一九八〇年代後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強權，使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無法解釋，在一九九〇年代獨留新古典經濟學和發展型國家理論競爭對經濟發展動力的解釋。（林文斌，2008）可以發現，「發展型國家理論」最初就是針對東亞高速經濟成長的現象，和新古典主義派（後來新自由主義派的基礎）主張市場引導（market-driven）為主因有不同意見而提出，以日本、韓國、台灣為主的經驗研究為基礎，主張國家引導（state-driven）為經濟發展成功主因。最早從Chalmers Johnson（1982）（“the developmental state”）解釋日本為何能達到高度經濟成長，隨後接續的知識系譜如Alice Amsden（1989）（“getting the price wrong”）、Robert Wade（1990）（“governing the market”）、Peter Evans（1995）（“embedded autonomy”）和Linda Weiss&John Hobson（1995）（“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當我們回顧「發展型國家理論」被提出的背景，會發現到打

從一開始，相互對立的，就只是理論層次的「發展型國家」和「新古典主義」，而這是對於同一現象的兩種解釋觀點。也就是說，「國家介入」和「自由市場」這組對張，在它所企圖解釋的現象中是同時並存的，這兩項解釋觀點最初也並非企圖為東亞國家**定性**，是國家介入型國家，或自由市場國家；而是企圖解釋這些東亞國家高速經濟成長的**成因**，來自國家，亦或市場。但是，往後的發展，如同一些學者已提出的，發展型國家的「理論」，和發展型「國家」兩者被混淆了。（鄭為元1999，林文斌2007）「國家介入」與否，時常被用以檢視「發展型國家式微了嗎？」

因此，由本文檢討自1994年至1997年漸進引入台灣並進入政策領域的「世界競爭力評比」，來回答一開始的提問：發展型國家為什麼會主動擁抱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的「世界競爭力評比」？可以得到的啟發，首先是這可能必須從「為什麼」的提問，修正為「如何」的提問。透過此個案呈現出，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的「世界競爭力評比」並非要求國家退出，相反要求國家承擔更多角色。以及重新回顧「發展型國家理論」被提出的背景，可以破除「國家介入」和「自由市場」這組對張。這也符合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指出東亞發展型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和新自由主義是可相符的，國家透過促進企業間、疆域間的競爭，和接受自由貿易並依賴出口市場作為經濟發展手段。國家也積極介入創造適合商業環境的基礎建設，新自由主義反而因此提供發展型國家透過國家介入（例如投資研發）以爭取國際競爭中的位置。（David Harvey，2005：72）

問題不是國家的角色是否重要，而是國家在市場中是什麼角色？美國的政治學者 Philip G. Cerny 提出競爭型國家(Competition State)的概念是在「全球化是否抵銷國家角色？」的辯論中提出的。以此概念檢視新自由主義全球治理中國家角色並未削弱甚至增強的現象，得到的結論是：是的，國家從未離去。但是今天的國家介入不是為了取代市場，國家政策是為了調整自己符合全球市場的需求，是為了使市場運作得更好。（Cerny，1997）以競爭型國家為理念型的相關研究，或可作日後繼續研究的參考。

破除了只要國家介入就是發展型國家，而非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前提後。再回到一開始的提問：台灣新自由主義化了嗎？作為一個強國家傳統，且不具自由市場信念的社會，新自由主義化的動力為何？本文認為，台灣引入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治理技術之一的「世界競爭力評比」的動力，並不是已經接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尋求政府改造。而是 1990 年代初媒體率先引介 IMD「世界競爭力評比」報告，台灣排名逐年滑落，遂有「喪失競爭力」之危機感。1996 年正值中共試射飛彈隔年，景氣衰退，民意期望政府回歸經濟，排除政治。第一屆民選總統新政府亟欲有所作為，提出「提升國家競爭力」施政願景。起初，在社會討論中反映出對「國家競爭力」的想像各有差異，在最後 IMD 世界競爭力指標進入政策領域，民間也開始以競爭力排名檢視政府績效，「世界競爭力評比」及其所蘊含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成為我們用以檢視「國家競爭力」的標準。在追逐抽象排名的同時，我們也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我們是在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同時接受意識形態，而非先認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才採取實踐。

## 參考書目

### 中文

#### 政府出版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5）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未出版。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委託長庚醫學暨工程學院許士軍等（1995）我國國際競爭力評估之研究。未出版。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1997）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經濟年報：提升國家競爭力。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2011）國際競爭力評比指標與運用策略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 期刊論文

王振寰（2003）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論東亞的發展路徑與轉型，《台灣社會學刊》，第 31 期，第 1-44 頁。

朱景鵬（2009）從國際競爭力評比析論政府效能提升之道，《研考雙月刊》，第 33 卷，第 2 期（總第 270 號，2009 年 4 月號）。第 19—29 頁。

呂建德（2001）從福利國家到競爭式國家？全球化與福利國家的危機，《台灣社會學》第 2 期，第 263-313 頁。

林文斌（2008）台灣「發展型國家」的調適或轉型？政府、金融與企業間關係的考察，《政治科學論叢》，第 37 期，第 95-150 頁。

瞿宛文（2000）全球化與後進國之經濟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第 91-117 頁。

鄭為元（1999）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第 1-68 頁。

#### 研討會論文

王振寰、蘇耀昌（2002）發展型國家興衰的不同途徑：台灣與香港比較，論文發表於「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黃崇憲（2004）流沙上的利維坦：台灣發展型國家所面臨的「積累/正當性」二元國困境初探，論文發表於「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 碩士論文

宋倩宜（2007）全球化、民主化以及台灣國家自主性與能力的變遷：以半導體產業為例（1995-2006）。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雨君（2010）去政治化的政治：台灣政治事件的敘事社會學分析。台北：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廖尉君 (2004) 東亞奇蹟或危機：發展國家與新古典理論的爭辯。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專書論文

黃崇憲 (2008) 利維坦的生成與傾頹——台灣國家研究範例的批判性回顧，第 321-92 頁，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社。

### 英文

#### 期刊論文

Onis, Ziya(1991)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24(1): 109-26.

Philip. G. Cerny (1997) Paradoxes of the Competition State: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2:2.

Philip. G.Cerny (2010) The competition state today: from raison d'Etat to raison du Monde, *Policy Studies*, Vol. 31, No. 1, January 2010, 5 21.

Sum, N-L. (2009) , The Production of Hegemonic Policy Discourses: "Competitiveness" as a Knowledge Brand and its Recontextualizations',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3 (2): 184-203.

Tore , Fougner (2006)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is there a future beyond 'the competition 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專書論文

Sum, N-L (2010)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Brands: Porterian „Competitiveness“ Discourse and its Recontextualization in Hong Kong/Pearl River Delta“ in Chilton, P., Wodak, R. and Tian, H. (eds) *Globalization Discourses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in press)

### 專書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New York

Woo-Cumings, Meredith, ed.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附件一 「國家競爭力」1991-1997 大事紀

時間	行動者	紀事
1991年8月6日	聯合報	第一次報導 IMD 世界競爭力台灣排名
1994年9月8日	聯合報	報導 IMD 報告台灣排名滑落自 18 名
1995年1月5日	行政院	核定「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以經濟自由化、國際化，促使國內、外人員、貨品、資金及資訊流通為目標。
1995年1月19日	聯合報	第一次以【頭版】報導〈新興工業國世界競爭力 台灣排名連年下滑〉
1995年7月2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飛彈發射及軍事演習，表示抗議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
1995年9月16日	聯合報	製作「回歸經濟疼惜台灣專題」，呼籲一場經濟救國的全民運動。
1995年12月27日	行政院經建會	因前年 IMD「世界競爭力」報告我國排名跌至 18 名，次於馬來西亞名，行政院遂委託長庚醫學暨工程學院製作「我國國際競爭力評估之研究」完成
1996年1月	聯合報	系列之三：檢視我們的國際競爭力
1996年3月23日	中華民國	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
1996年4月25日	行政院經建會	提出「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構想」，將 2000 年達到全球競爭力前 5 名訂為畫目標之一。
1996年5月1日	經濟部長江丙坤	經濟部長江丙坤在國民黨中常會提出「突破制限、改革創新、提升國家競爭力-邁進已開發國家」專題報告。
1996年5月3日	高希均	投書支持江丙坤「提升國家競爭力」提議，並建議行政院組成產官學代表工作小組，限期 3-6 個月提出具體辦法。
1996年5月5日	聯合報	社論〈呼應江丙坤部長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倡議〉
1996年5月6日	逢甲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鄒繼琳	投書〈主動推展兩岸成為「自由貿易區」，讓「兩岸和平」推高國家競爭力〉
1996年5月20日	總統李登輝	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儘速營造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經濟體系，提升國家競爭力是國家未來的施政方向。」
1996年6月7日	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	在行政院記者會中指出：「行政院要以提高國家競爭力為革新的主軸。要在 21 世紀來臨前，進入全球前五名。」
1996年6月9日	逢甲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鄒繼琳	投書指出競爭力的具體指標應為「經濟成長率」和「國民所得」。
1996年6月10日	聯合報	社論呼籲破除排名迷思，認為不同國際機構指標標準不一，行政部門只要能認真規劃及推動關鍵性的政策課題，國家競爭力就會自動提升，不須追求排名。

1996年6月14日	總統李登輝	指示「政府可以考慮邀請產、官、學及民意代表成立一個專案組織，探究國際間普遍重視的各項競爭力評量指標；依據這些指標，切實地分析我國和其他發展程度相近的國家、地區或經濟體，彼此間的相對優缺點。」
1996年6月19日	中國生產力中心	行政院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廣徵企業界對於「提升國家競爭力」建議。並協調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及中小企業協會等意見。
1996年6月22日	財團法人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	舉辦「提升國家競爭力之策略」座談會，邀請研考會主委、經建會副主委、立委、全國工業總會執行秘書出席。
1996年6月24日	行政院政務委員馬英九	政府官員首次在公開演說中引用IMD國家競爭力指標排名。
1996年6月30日	財政部	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為由，推動「低稅負、無障礙」。
1996年7月1日	行政院	成立「行政院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由產官學代表組成界定為「全民運動」。
1996年7月6日	副總統連戰	在「行政院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綱領」上宣布將參考「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及「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評比報告制定競爭力指標，組成7個工作小組。
1996年7月7日	競爭力策進會召集人石滋宜	民間組成的「競爭力策進會」表示將製作一套指標調查民意對立法委員的看法以監督國會，另外將與教育部長討論將提高生活品質的方法納入小學教科書，以推動「心靈改造」。
1996年7月10日	財政部長邱正雄	IMD競爭力報告中台灣股市市場紀律排名倒數，財政部長表示會進一步研究改進。
1996年7月11日	台灣競爭力發展顧問公司	廖福本、施台生等為首的一些國民黨籍中央及地方民代便串連合組「台灣競爭力發展顧問公司」。
1996年7月11日	經建會主委江丙坤	經建會主委江丙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向總統李登輝報告「提升國家競爭力，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表示IMD和WEF的競爭力報告排名都顯示我國弱項為「經濟建設」和「經濟開放程度」。
1996年7月15-18日	聯合報	製作四日「提升國家競爭力系列報導」
1996年7月15日	行政院經建會	經建會副主委薛琦引用IMD對國家競爭力的定義：「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創造財富的能力與八大類有關，包括國內經濟實力、國際化程度、政府效率、企業管理、金融實力、基礎建設、科技實力、人力及生活素質。」

1996年7月19日	中央銀行	央行不滿 IMD 對其評比排名落後，表示可能因企業與央行觀點不同，才有這種結果。
1996年7月24日	中央銀行	央行應經建會計畫成立「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財政金融分組」，列出影響我國競爭力的劣項，包括：資本市場限制、內線交易嚴重、金融法規無法穩定金融以及「中央銀行」本身。
1996年7月25日	文訊雜誌	舉辦「提升文化競爭力」座談會。
1996年9月13日	行政院經建會	將地方政府納入「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管考，並訂定指標。
1996年10月7日	工商協進會、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工商建研會、中小企業協會、全國總工會等民間團體	依據行政院行動綱領，成立「中國民國國家競爭力策進會」，下設兩個工作小組，一為「調查研究組」，由台灣經濟研究院負責；一為「推廣宣導組」，委由中國生產力中心負責。另設「秘書組」，委由工商協進會負責，擔負策進會與政府、民間之協調工作。
1997年3月3日	行政院主計處	主計處依自行制訂之「國家競爭力指標計算系統」，預估今年競爭力應可自 18 名進步至 16 名。
1997年3月27日	行政院經建會	IMD 公布當年世界競爭力排名為倒退至 24 名，經建會副主委薛琦表示不重新評估 IMD 指標的參考價值。
1997年4月7日	行政院經建會	經建會去函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詢問今年我國競爭力排名大幅落後的原因，獲知去年我國經濟表現不佳，是最重要的原因。
1997年4月7日	聯合報	專訪競爭力大師、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麥可·波特，表示台灣 IMD 競爭力排名倒退，顯示需要一個更小的、減少干預的，角色適度轉變的政府。
1997年4月8日	競爭力大師麥可·波特	麥可·波特應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之邀，來台出席「建構台灣競爭力」演講，表示不須太看重 IMD 指標，該指標可敦促政府，但提升競爭力應由產官學合作。
1997年4月23日	聯合報	批評政府「質疑指標，不如面對問題」。行政院不必為了波特教授的質疑而否定自己，也不必因為一時的執行不力而洩氣。
1997年5月25日	IMD 校長彼得·羅藍吉	IMD 校長彼得·羅藍吉應經建會之邀，來台北舉行公開演講說明為何台灣競爭力排名大幅倒退。表示總排名不重要，應找到有利指標項目發展。
1997年7月	行政院經建會	出版《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經濟年報－提升國家競爭力》